

谢本书



学研究回顾

XIE BEN SHU SHI XUE YAN JIU HUI GU

谢本书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出版人：曹维琼
责任编辑：谢丹华 杨雅云
封面设计：张 彪



ISBN 978-7-221-09241-0



9 787221 092410 >

定价：32.00元

谢本书史学研究回顾

——尊重历史

谢本书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谢本书史学研究回顾 /谢本书著. —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0. 12

ISBN 978—7—221—09241—0

I. ①谢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史学—研究 IV.

① K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(2010)第 244400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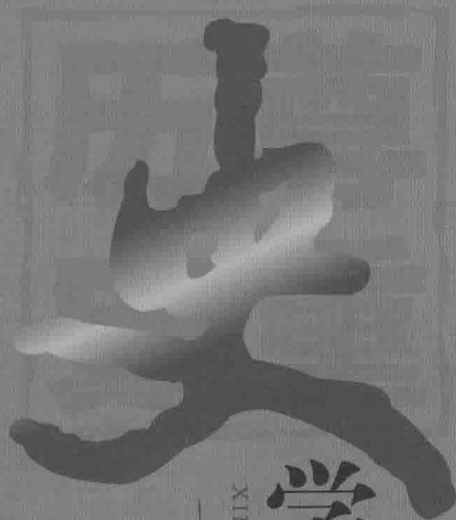
书 名 谢本书史学研究回顾
著 者 谢本书

出 版 人 曹维琼
责任编辑 谢丹华 杨雅云
封面设计 张 彪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
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号 550001
印 刷 贵阳德堡快速印务有限公司
规 格 787×1092毫米 1/16
字 数 300千字
印 张 20.75
版 次 2010年 12月第 1版
印 次 2010年 12月第 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—7—221—09241—0
定 价 32.00元



谢本书，男，汉族，四川邛崃人，1936年生，云南民族大学教授、研究员，云南文史研究馆馆员。历任云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、《历史研究》编辑部编辑、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、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、云南民族大学历史系主任、中国史学会理事、中国抗战史学会理事、云南史学会会长、南京大学客座教授、云南省政协委员、云南省志副总纂、云南文物局专家组成员、云南中华周易研究会会长、云南师大西南联大研究所研究员、云南西南联大研究会副会长、昆明市文史研究会副会长、昆明市政协文史委顾问等职。出版著作50余种，发表文章500多篇，个人执笔字数达1000多万字，成果多次获奖。1989年获“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”，2006年获“云南省有突出贡献哲学社会科学老专家”等称号，1996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此外，英国剑桥国际人物传记中心1997年授予其曾“20世纪成就奖”（银质奖章及证书）。

谢本书



学研究回顾

XIE BEN SHU SHI XUE YAN JIU HUI GU

谢本书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前 言

2006年6月8日,由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云南民族大学主办,云南中国近代史研究会、云南中华周易研究会承办,在云南师范大学田家炳书院举行了“谢本书教授从事史学与研究50年座谈会”,同时还举行了《谢本书史学研究述评》(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版,22万字)一书的首发式。出席座谈会的有来自北京、湖北、四川、贵州和云南的各高校、研究机构及相关领导、专家学者100多人。会议由云南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会长、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璋主持。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马丽娟教授,中共云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周本贞教授,云南省史学会会长、云南大学原副校长林超民教授,贵州人民出版社社长、编审曹维琼,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吴达德,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张神根,云南民族大学教授汤明珠,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田虎青,昆明市志办编审马颖生,昆明市盘龙区新闻宣传中心记者李国庆,昆明警察学校高级讲师李开林等,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。

这次活动以及由曹维琼、吴达德主编的《谢本书史学研究述评》一书的首发式,事实上是由上世纪80年代,我在云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担任所长、研究员期间所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们为主导,联系相关单位举办的。这批研究生虽然只有8人(后我因工作变化,中断了招收研究生,晚年回到云南民族大学,再度重招研究生),但他们都已成为各单位的骨干,而且多数已为教授、研究员、编审等正高职,成绩显著,深感欣慰。

《谢本书史学研究述评》(以下简称《述评》),对我一生的学术成就进行了初步总结。《述评》共收10多篇文章,它们的标题和作者是:序(赵瑞芳)、谢本书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述评(吴达德)、谢

本书历史人物研究述评(曹维琼)、谢本书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(汤明珠)、谢本书军阀史研究述评(张神根)、谢本书爱国主义研究述评(龚喜春)、谢本书地方史研究理论与方法述评(袁国友)、谢本书云南地方史研究述评(牛鸿宾)、谢本书云南边疆民族研究述评(张赟)、谢本书云南文化史研究述评(王国平)、谢本书历史教学方法研究述评(胡德斌)、谢本书——云南近代史研究领军人(吴宝璋)。此外尚有三份附录:我的二弟(谢本初)、父亲的路(谢嵩文)、谢本书史学论著目录(宋光淑),以及以“编者”名义、实为吴达德执笔的“后记”。

“后记”大意说,当我 70 华诞之际,各地的学生和亲友,分别执笔撰写文章,对我半世纪以来的史学教学与研究略作评述,表达崇敬和庆贺之意。这就是撰写这本书的缘起。“后记”特别提到,在报考研究生时,“我们没有刻意地过多地考虑培养单位是否名牌大学或名牌研究院所,就是奔着‘谢本书’而去的。”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。我要说的是,这批研究生的成才,是和他们自己的刻苦努力分不开的。

这次活动效果较好,对于我和我的研究生来说都是一次鞭策和鼓励。当曹维琼先生参加会议即将离开昆明,以及后来又见面时,不止一次向我提出建议,希望我能动手写一本学术自传,作为《述评》的姊妹篇,也许会给学术界留下更多的启示。

我自己虽然终身从事史学教学与研究,但是身处边疆,取得的成就很有限,因而迟迟未能动笔。当我满 73 岁之后,我忽然想起一句民间谚语:“七十三,八十四,阎王不请自己去!”我已经到了去阎王爷报到的年龄。如果不抓紧做点事,也许真的要向阎王爷报到了。加上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先后去世的已有 20 多位,这给我很大震动。于是,只好在自己还有精力的时候,开始考虑学术自传的事。尽管我现在还兼有 20 来个社会职务,虽然说多数是挂名的,可是会议也不算少,挂名职务有时还得应付,所以时间得抓紧,

否则是难以做完这件事了。

考虑学术自传,总得要有一个主题,题写一个书名。在我一生超过半世纪的学术生涯中,既有一帆风顺的时候,而更多的则是在颠簸挫折中度过的。然而,我却愈来愈意识到不管是顺利之际,还是遭受挫折之时,都应当坚持一个原则,坚持自己的历史底线,这就是四个字“尊重历史”。为了与《谢本书史学研究述评》相呼应,这本书最后的取名为《谢本书史学研究回顾——尊重历史》。

与学历史的人谈“尊重历史”,也许是多余的。然而,历史告诉我们,学历史的人,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的人,不“尊重历史”的还是大有人在的。例如不尊重历史事实,不重视史料的搜集,甚至任意杜撰,虚构编造或者随意解释史料的现象,时有发生。我在若干问题的研究中,曾经遭到质疑、攻击、歪曲,以至告状之事,亦有发生,要不要尊重历史,维护历史的尊严,要不要为强权所屈服,还是有所思索,有所斗争的。最后,我的结论是,研究历史,应当有自己历史的底线,这个底线就是尊重历史、维护历史的尊严。对于历史学者来说,尊重历史,就是尊重科学。

尊重历史,对我来说,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:

首先,尊重历史事实,这是研究历史的前提,对于真实的历史,历史史料,历史细节,尽力尊重,决不夸张或缩小,也不编造和篡改,事实就是事实。对于浩如烟海的史料,在研究过程中,可以鉴别,可以选择,有的可以回避,但决不允许编造、篡改、虚构,弄虚作假。一切以客观的史实为研究之准绳,可以向史实叩头,而不能向压力、强权屈服。这是作为史学家的良心所在。

其次,尊重历史逻辑,这是研究历史的必要条件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和逻辑,尽可能客观地叙述、论证、演绎,不溢美,不掩恶,不过度诠释,也不搞屈从于政治和现实的影射史学。这是尊重历史的重要内容,是作为史学家的修养所在。

尊重历史,这是我从事史学研究的底线。我认为,如果超过这

个底线,就是踩了历史的红线,迟早要受到历史的惩罚的。

当然,史料的判断,逻辑的推理,都不可能一次完成,都需要与时俱进。然而,尊重历史同与时俱进,可以在一定条件下,和谐共生,相得益彰。尊重历史有助于与时俱进;与时俱进,有助于深化尊重历史。这是又一个历史辩证法。

“尊重历史”,成了我从事史学教学与研究的历史底线,也成了我从事史学教学与研究的座右铭。无论什么学术问题,也无论受到歪曲和攻击,我不会在这个底线上退却。除非史实错了,逻辑推理错了,才可以向真理屈服。

“尊重历史”,看似简单的一句话,却是在我艰难坎坷的学术生涯中,探索出的一个原理和原则。其实,“尊重历史”也是我进行史学研究创新的开端和起点。

这就是我把自己的学术自传、学术回顾取名为“尊重历史”的初衷。

著名学者章开沅教授提倡“尊重历史,超越历史。”我非常欣赏。他的意思是说,研究历史需要进得去,又需要出得来。不过,我觉得再补充一点是,尊重历史是第一位的,是基础。只有真正尊重历史,才谈得到超越历史,也才谈得到“进得去,出得来”。

2009 年底于昆明

目 录

前 言

- 一、学术生涯的开端——从北洋军阀史研究入门 (001)
- 二、史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——学术生涯的转折 (009)
- 三、李文学起义的调查与研究——从田野调查入手探索
..... (025)
- 四、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与实践——从蔡锷研究说起
..... (032)
- 五、护国运动史的研究——一个新的焦点 (042)
- 六、唐继尧研究——一个未曾想到的麻烦问题 (051)
- 七、西南军阀史与地方实力派——一个新的研究领域
..... (063)
- 八、云南地方近代史研究——研究深化的一个方面
..... (077)
- 九、彝族风云将领研究——龙云、卢汉与张冲 (093)
- 十、两位腾冲历史文化名人——李根源与艾思奇 (107)
- 十一、为活着的名人写传——虽方便,却要尽可能客观
..... (116)
- 十二、文集与史料集——探索的足步 (125)

十三、爱国主义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——在探索

中前进 (137)

十四、中国革命史与中共党史——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

方面 (146)

十五、近代云南历史之谜——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

..... (156)

十六、自述与治学——自我总结的尝试 (170)

十七、云大名师——我的老师们 (179)

十八、教师的追求——乐意于教书匠的一生 (193)

十九、学术年表 (204)

后记

附录：评价文章选录十三篇 (247)

跋 吴达德(314)

一、学术生涯的开端

——从北洋军阀史研究入门

(一)

我是1954年由四川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读书的。云南大学是国内有一定知名度的高等学校,当时的校长李广田教授是著名的文学家、诗人,享有崇高的威望。而云大历史系则是云大教授集中、名师荟萃的一个系,如著名学者,在民族史、民族学方面有方国瑜、杨堃、江应梁;在世界史方面有纳忠、张家麟、方德昭;在中国史学方面有李埏、张德光、马开梁、李为衡等。我到这个学校历史系学习是非常高兴的,尽管入学时我只有初中毕业的知识水平,但在名师们的指导下,进步还是比较快的。毕业时因成绩较好,被选中留校任教。我的学术生涯就是从毕业后留在云南大学开始的,其时年方23岁。

在读书时,由于受著名教授、阿拉伯历史学家纳忠先生的影响,对那时方兴未艾的亚非拉地区反对帝国主义、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历史非常感兴趣,所以毕业留校,即留在云大历史系亚洲史教研室任教。

1959年我大学毕业留校,担任历史系教学秘书,次年即上讲台,讲授亚洲史的东亚部分。那时历史系历史专业有三门专业基础课,即中国通史、世界通史、亚洲通史。我所在的教研室叫亚洲史教研室,室主任方德昭教授(时为讲师),成员只有4人,分工我负责东亚部分的教学。我过去没有学过亚洲史课程,毕业后备课半年,边教边学。然而一年后,系上根据上级的指示,亚洲通史不再作为单独的基础课,其内容并入世界通史之中,亚洲史教研室随

即撤销。教研室原4人,两人分去教世界史,两人分去教中国史。我作为去教中国史的人员之一,分到中国近现代史教研究,室主任为李为衡教授(时为副教授),分给我的课程是中国现代史(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通史),起止时间为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

(二)

毕业的第三年,我开始了中国现代史的授课工作。中国现代史从1919年五四运动讲起,而五四运动时期正是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历史阶段。不久,讲到北伐战争,打倒的对象也是北洋军阀。然而对北洋军阀统治中国10多年的历史,过去的教材都比较简单,而且只从革命史方面讲,对北洋军阀及其历史讲得很少,北洋军阀历史研究几乎成禁区。我对北洋军阀史及其相关概念,也不甚明了。我想自己都弄不大明白,怎么去教学生呢?教大学不比教中学小学,可以照本宣科,而要以更丰富的知识启发同学思考问题。因此,我从教好中国现代史出发,选择研究北洋军阀史,作为自己学术生涯的开端。

然而在当时条件下,研究军阀史却是困难重重,不仅成果少,资料难觅,思想障碍亦甚大,真有点寸步难行。

以思想障碍来讲,不妨举几个事例来加以说明。

例一,“白专道路”。

1962年秋天,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,阶级斗争的弦绷紧了,阶级斗争要年年讲、月月讲、天天讲。学校里也要抓阶级斗争,其中批判“白专道路”,提倡“又红又专”,就是抓阶级斗争的一环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把主要精力用去钻业务,搞科研,尤其是去搞军阀史研究,被认为是走“白专道路”的典型,因而遭到批判,弄得灰溜溜的。

例二,“信件警告”。

研究北洋军阀史,搜集资料过程中,我曾在云南省档案馆查阅过部分资料。1964年3月12日,我在《光明时报》发表短文一篇,题为《“南与北如一丘之貉”》,根据新的资料,揭露西南军阀与北洋直系军阀相勾结的事实,从而证实孙中山关于“南与北为一丘之貉”的论断是有根据的。本文引用了在云南档案馆查阅的片断资料,而且这些资料已是近50年前的东西,没有任何保密价值,何况抄阅是经档案馆同意,并盖了章的。但是,文章发表后,云南档案馆就给云大去信,说我引用档案馆资料写文章,事前未给档案馆报告并取得同意,是错误的,应提出严重警告,要云大对我进行“教育”。其时,我已借调至北京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处工作,云大将信转到北京,中宣部教育处党支部书记确实对我进行了一番“教育”,作了严厉的批评。

例三,“落井下石”。

“文革”之初,我因一度借调北京工作一事,被认为是“反共老手”翦伯赞安在云南的“钉子”,“反动学术权威”黎澍的“修正主义苗子”,遭到审查批判。在批判过程中,我研究北洋军阀一事也被抬了出来,作为批判材料,一位教中国革命史的老先生,以及某些左派人士,振振有词地批判说:“一个青年教师,一个共产党员,不好好地研究革命史、研究革命烈士,却去研究北洋军阀史,为军阀树碑立传,立场到哪里去了,屁股坐到哪里去了。”并质问:“你的研究到底要干什么?”这实际上是“落井下石”,给我的“罪名”又添加了新的材料。

类似的例子,时不时还会出现,真使人感到研究工作寸步难行。

至于资料搜集的难度,在边疆地区是可想而知的。书籍缺乏,旧报刊很少,档案资料仅局限于云南省档案馆所藏资料,我只能尽自己的力量努力去寻找。还好的是,我的夫人宋光淑女士,曾在云

大历史系图书资料室、云大图书馆工作,她为协助我搜集资料创造了条件。例如,其时《梁启超年谱长篇》尚未公开出版,我得知上海图书馆存有一套“长篇”的油印稿本,即请宋光淑通过云大图书馆向上海图书馆以“馆际交流”的形式,借来使用了一个时期。

在困难的条件下,我坚信自己为提高教学质量而研究北洋军阀史,没有什么错误。你批你的,我搞我的。经过两三年的努力,已搜集了相当数量的资料,发表了几篇文章,其中在《历史教学》杂志1962年第6期发表的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京政权元首国务总理更迭表》颇受欢迎,为后来一些资料、工具书所转用。此外,还发表了《试论历史人物评价》(《史学月刊》1965年第7期)、《论张謇实业活动的目的》(《经济研究》1966年第1期)、《对“护国战争”几个问题的认识》(《历史教学》1966年第3期)等,这些都是研究北洋军阀史的副产品。同时完成了《北洋军阀史》初稿10多万字。由于1964年后,借调北京工作,初稿未能作进一步的修订,待到从北京回到云南,“文革”风暴旋即来临,《北洋军阀史》初稿只好束之高阁。尽管如此,由于有了一些研究,中国现代史的教学质量明显提高了,受到了学生的欢迎,并在云南大学教学经验交流会上作了汇报、交流,受到好评。

“文革”期间,“革”文化的“命”,出版事业陷入了停滞状况,除了毛选、样板戏、“文革”宣传品以外,几乎没有出版任何书刊。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,出版事业才有了松动。1973年,刚刚恢复了业务工作的中华书局,准备考虑出版一点科技文化读物。那时现成的书稿并不多,即使有人有书稿,也心有余悸,不敢或不愿拿出来,因此约稿者颇感失望。中华书局一位编辑不惜来到昆明,到云南大学约稿,我得到消息,询问他们是否愿出版一部10余万字的《北洋军阀史》,稿子是现成的,稍作修改即可。编辑似有为难之处,表示专著以后再说,但可以考虑将这一选题列入“历史知识读物”之中,出一本字数约3万字的《北洋军阀》。于是,我接受这

本3万字的读物的约稿,以原初稿为基础,根据出版社对“读物”的写作要求,改写成可读性较强的本子。这样这本3万字的《北洋军阀》的小册子,终于由中华书局于1974年9月出版,这是我的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这本小册子,在那个“书荒”的年代,印数不算少(版权页未注明印数),引起了读者的注意,我曾收到读者几封来信,询问相关问题。随后我又接受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之约,于1979年2月出版了同样约3万字的《话说北洋军阀》的小册子,第一次印刷达300.000册,列入“少年百科丛书”之中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,出版事业逐步走上正轨。我将自己原有10多万字的《北洋军阀史》初稿,进行补充、修订,增到近20万字,送交云南人民出版社。等了几个月,我去云南人民出版社询问书稿审查情况。出版社历史编辑室负责人答复说,研究北洋军阀的人很少,在云南找不到人审稿,书稿至今还未进行审读。于是我说,既然找不到人审读,请退还原稿,我另找出路。我实在不知道,他们是真的找不到审稿人,还是不敢出版军阀史方面的书籍。后来,有人转告,云南人民出版社一负责人说,老谢给他们北洋军阀史稿件,是有意给他们出难题。换言之,他们未能接受这部书稿,主要还是思想障碍。由于这部书在云南人民出版社碰到如此遭遇,所以后来一个时期我的大多数著作,都未送云南相关出版社出版。可是,他们中有人却说什么,老谢的著作,多数在省外出版,是看不起省内出版社。这是一种误解。其实,我早年著作在省外出版较多,主要原因是两条:一是省外答复爽快,出版周期较短;二是不要出版资助,稿费标准还略优于云南。

我在收回《北洋军阀史》书稿后,立即转寄上海人民出版社。我并不熟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,但是在收到稿件后不久,该社历史编辑室的莫永明先生,即回我信说,他们接受该书的出版。我当然高兴,复信表示感谢。莫永明编辑此书,花了很多功夫,还在上海代作者寻找了20多幅珍贵照片收入书中。他又给我信说,据